

经济

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日本经济



东京证券交易所
©Tokyo Stock Exchange
亚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约有2000多家企业上市
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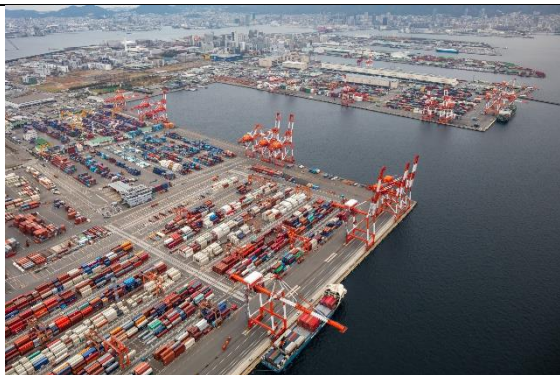
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

二战后的日本工业基础设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日本战后的经济正是在这样一片战争废墟上发展起来的。1952年，在盟军占领结束之时，日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水平仅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在其后二十年间，日本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第一个从战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原因在于个人储蓄和私营企业投资的高增长率、高度勤劳的劳动力大军、低价石油的充足供应、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以及政府对私营企业的

有效干预。战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GATT）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日本是主要受惠国之一。1968年，日本经济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1950年—1970年间，日本城市人口的比例从34%上升至46%，工业从业人口迅猛增长。60年代，日本工业竞争力稳步提高，年均出口增长率高达18.4%。在60年代中期之后，除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两年，日本的经常项目每年均为顺差。日本产业结构重大调整带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而以高额个人储蓄利率为基础的私营项目投资热潮也给予这一增长以有力的支持。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主体由从

神户人工岛
等待装船的集装箱。工业产品的海外
出口是日本战后经济增长的关键。



前的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转为以重工业为主。钢铁业、船舶制造业、机械工业、汽车制造业和电子设备产业成为工业部门的主导产业。

1960年12月，池田勇人(Ikeda Hayato)首相公布了一项收入翻倍计划，将1961至1970年这十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年均增长率定为7.2%。政府此举旨在扩大工业基础的经济规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截至1968年，国民收入翻了一番，从而使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远超预期，高达10%。

成熟的经济

田中角荣首相倡导的“基本经济和社会计划”(1973年2月)预测1973—1977年间日本经济将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然而到了1973年，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加，从而使房地产市场和国内商品市场出现了大量的投机行为。1973年10月，“石油危机”爆发，能源和其他消费品价格暴涨，由此引发了中东战争。当时，日本正苦于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同一时期，汇率市场正在向能准确反映日元实力的浮动汇率制转型，日本出口产品价格上升。1974—1979年，经济增长率由10%降至3.6%；到了80年代，则徘徊在4.4%的水平。

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促进了日本的工业结构从强调重工业到开发新领域的根本性转变，例如，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到了70年代末期，计算机、半导体及其他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产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口贸易在日本经济增长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使得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更注重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呼声越来越高。

泡沫经济

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迅速升值，在1988年达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的水平——是实行固定汇率制的1971年的3倍。由此引发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增长削弱了日本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但政府的财政措施却促进了国内需求的增长。

1988年和1989年，公司投资激增。股票价格不断上涨，新股发行后市值急剧攀升，成为各公司筹措资金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银行也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寻求投资渠道。企业却转而利用其拥有的房地产所有权作为股市投机的抵押，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地价翻倍，东京日经股市指数上升了180%。

1989年5月，日本政府紧缩其货币政策，来抑制土地等资产的价格上涨。然而，银行的高利率导致了股市价格持续下跌。到1990年底，东京股市的股价下跌了38%，损失300万亿日元(2.07万亿美元)，地价也从其投机的巅峰陡然暴跌。这种经济突然陷入衰退深渊的现象便是所谓“泡沫经济”的“破灭”。

1995年以后的经济

泡沫经济后的经济衰退贯穿了90年代的后半期并延续至新千年，只在1995年和1996年有过短暂的经济复苏。部分原因是日元贬值，以及1995年1月的阪神大地震后的重建工作所产生的特殊需求。然而在1997年，消费税的上涨、政府投资行为的减少、以及主要金融机构的破产等一系列因素使得经济衰退状况迅速恶化。持续下跌的地产价格使金融机构的坏账数额巨大，给他们造成沉重的负担，使其不得不紧缩

信贷政策，迫使企业减少其厂房和设备投资；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减少，导致几乎所有产业利润的降低；员工的工资随之减少，从而使消费支出进一步下降，1998年的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

1998年，日本政府建立了一项60万亿日元的债务转期计划，提供必要的公共基金以促进经济复苏，同时还额外划拨40万亿日元作为应对金融机构信贷紧缩的应急措施。1999年度的国家预算包括增加公共设施建设，通过增加房贷扣除额度等减税等内容。从1999年2月开始，日本银行实行短期的零利率政策以放宽货币供应量，3月，政府将7.5万亿日元公共基金投放到15家主要银行。

由于这些措施以及亚洲市场对日本产品需求量的上升，1999年底和2000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一些产业的股票价格开始上扬，收益也有所增长。然而，到了2001年，由于各种国内问题—内需的疲软、通货紧缩，以及银行长期背负的巨额坏账—加之因美国经济的衰退而导致日本出口下降等国际因素，使日本经济重又滑入经济衰退的泥潭。1990年为2.1%的失业率，到2016年上升到3%。

2002年初，日本经济跌入谷底，从此进入了一段缓慢但却平稳的恢复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在十多年的徘徊之后，“泡沫经济”崩溃的负面影响最终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消除。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利率从2002年的8%以上降至2006年的2%以下，这是由于银行可以再次全面发挥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其贷款能力得以恢复的结果。

为了结束经济长期放缓并克服通货紧缩，从2012年开始，第二次安倍内阁实施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

安倍经济学基于被称为“三支箭”的三个政策。第一支箭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增加流通货币量来消除通货紧缩的倾向。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政府通过10万亿日元资金实施各项经济政策，带头创造需求。第三支箭是“经济产业成长战略”，其目标是通过放松管制创造



老龄化社会

老龄人口的增加给经济带来了各种影响。

一个能够使私人公司和个人积极参与的社会。这些政策实现了实际GDP的增长，同时减少了失业人数和破产数。

政府日益关注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将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截至2018年，人口的约28.1%在65岁以上。而到2060年，这个数字估计将达到39.9%左右。为了将劳动人口缩减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有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妇女和6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此外，还有必要进行养老金及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改革，以避免在几代人之间在负担和收益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2019年，为解决中小企业人手严重不足问题，开始增加接纳外国劳工。他们成为护理、建筑行业、工业、农业等领域的有效人力补充。

加强与亚洲的联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制成品占有日本进口商品的百分比有了很大的提高，1990年超过了50%，90年代末则超过60%，这也加剧了人们对日本产业空心化的担忧。1980年代中后期，由于受到贸易摩擦问题和日元升值的影响，主要从事出口的企业不得不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东南亚等海外地区，海外基地生产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和日本。目前，日本的进口量高于国内生产量。

近些年来，来自中国的制成品进口的急剧增加引起了特别的关注。2001年至2005年期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上升了170%。虽然在同一时期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比率更快，达235%。

2018年，中国在日本海外贸易中的份额增长到21.4%，而美国的份额下降到15.0%。日本的数字家电以及汽车相关出口坚挺，自2007年起，对华出口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日本的对华贸易自从1988年赤字持续20多，但因为日本对香港的产品大部分被再次出口到中国，所以如果以出口为基准的话，日本对华贸易则为顺差。2014年到达顶峰，此后贸易赤字有所下降。

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的同步增长，部分原因是由于制造业的全球化而导致了劳动力的国际化配置。日本公司通过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建立生产设施，出口生产资料（机器）和半成品（零部件等）并在那里制成成品，然后再进口返销到日本。就目前而言，依然存在着垂直的劳动力分工，日本专门负责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和加工，而中国则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加工。然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在不断提高，所以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方面保持相对优势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挑战。

随着到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数量的迅速增加，入境旅游消费已增长。访日海外游客骤增，他/她们在日本国内的消费大幅增加，2015年，海外游客在日本境内用于住宿、餐饮等的费用首次超过日本游客境外旅游花费的金额，实现了1962年以来的首次盈余。大多数游客来自邻近的亚洲国家。2018年，从中国、韩国、台湾以及香港到日本的游客人数占所有外国游客的70%以上，2018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入境旅游消费占比超过70%。



秋叶原电器街的店头场景（东京）

无论是电脑配件还是家电产品，在秋叶原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电器产品。